

竞合视角下小池滨江新区跨界发展的问题及路径改进^{*1}

徐利权¹ 周均清^{*1, 2} 韩枫³

(1.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中国湖北武汉 430074;

2.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中国湖北武汉 430074;

3. 山东同圆设计集团, 中国山东济南 250001)

【摘要】：以湖北小池滨江新区为例，探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省际跨界区域这一典范地理空间当前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改进路径。基于小池滨江新区试图通过土地开发推动九江市人口和产业要素跨界流入受阻的现实问题，借助竞合理论，构建了“合作的共同收益、偏好的多样性、博弈者地位和实力的不对称、博弈结构和参数的稳定性”四个层面的问题成因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九江市合作积极性不高，经济领域合作难以深入，“强—弱”跨界类型难融合，小池滨江新区吸引力不足是导致跨界发展受阻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政府层面的“经济特区”与市场层面的“边缘城镇”是改进小池滨江新区跨界发展路径的有效手段，可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省际跨界发展提供启示。

【关键词】：竞合理论；跨界发展；省际边界；小池滨江新区；路径改进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 - 8462 (2017) 11 - 0076 - 08

DOI：10.15957/j.cnki.jjdl.2017.11.010

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区域城镇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使得城市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跨界发展的需求也日益强烈。过去城市间的竞争主要是讨论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当前全球化的跨国投资模糊了经济活动的国界，原来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日益演变成城市或城市区域之间的经济竞争^[1]，迫切需要地方政府与市场协同应对来自区域城市的竞争压力，市场要素的竞争延伸到城市间的竞争。一方面，城市间高度自由竞争催生了各种园区、新区建设，政府通过土地推动了我国近30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2-3]；另一方面，由于城市间竞争缺乏良好的秩序，容易带来多方面负面效应，如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招商引资大战等^[4-5]。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如何打破地区行政壁垒，推动区域统筹发展，使得城市间的竞争开始关注“多赢”格局，“跨界发展”成为必然。

¹ 收稿时间：2017 - 04 - 23；修回时间：2017 - 08 - 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278210、51408248）

作者简介：徐利权（1986—），男，湖南浏阳人，博士/博士后，助理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等。E-mail：383142828@qq.com。

***通讯作者**：周均清（1972—），男，湖北随州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规划管理等。E-mail：zhjqing@foxmail.com。

1958 年荷兰和德国的边境建立了首个官方的跨界区域（cross-border-region），随后，类似跨界形式在欧洲不断形成与发展。学者们也提出了诸多跨界区域的概念，如强调市场力量的“跨界区域生产体系”^[6]、注重文化与贸易联系的“姐妹城市”（Sister City）^[7]、突出区域共同身份意识的“跨境双城”（Binational City）^[8]等。但普遍认为，跨界区域是两个或以上不同主权的相邻领土单元、文化共识、归属感与共同利益以及新的管治层级与自治机构^[9]。跨界区域可以理解为是跨界发展的空间表现，根据 W.S. James 等^[10]对跨界发展特征的总结，认为其应包含四个特征：第一，因为跨界发展的主导者是政府，所以跨界发展往往会在公共领域内展开；第二，跨界发展通常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合作主体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第三，跨界发展最主要的作用在于从更加广泛的空间层面对社会运行中的实际问题加以解决；第四，跨界发展需要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形成一种稳定的跨界联系。根据 Buursink 等学者提出的双子城概念，跨界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物质空间融合（Physical Integration）、行为融合（Behavioral Integration）、组织融合（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以及政治和管理融合（Politico-administrative Integration）^[11]。尽管上述融合过程不一定完全按阶段依次推进，但对跨界区域发展阶段的评价对充分认识与推动跨界区域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12]。

国内在跨界治理方面的研究较多，包括从伙伴关系的理论视角研究长三角城市合作的类型、机制、特征^[13]；珠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动力机制的变化下，多层次的区域管治^[14]；港深跨界发展与融合等^[15]；通过双子城（Twin City）理论框架对杭州临平—嘉兴海宁跨界区域进行分析^[12]；以及对跨界新城形成机制、空间组织及管治模式^[16]，跨界产业园的形成与发展^[17]等方面都有研究。但从已有研究成果看，跨界发展和其主体类型密切相关，既有国家层面的跨界区域、又有省际跨界区域、还有省内地市间的跨界区域^[18]。不同地区、不同尺度的跨界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受区域一体化的影响，跨界发展取得较好成效，研究成果也较多；而中、西部地区受到体制、观念、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影响，在区域跨界发展方面成效不佳，特别是省际跨界发展更是艰难。伴随着“中部崛起”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国家战略的出台，长江中游地区省际跨界发展必将成为未来的新趋势，本文选择位于湖北省与江西省交界的小池滨江新区作为实证案例，在对其跟踪研究的基础上，从竞合视角探讨省际跨界发展的问题及路径改进，为类似地区的发展提供启示。

1 小池滨江新区跨界发展的内涵及问题

1.1 小池滨江新区跨界发展的内涵

根据跨界区域的概念，跨界发展涉及到两个或以上的行政单元，主要存在着“轴向发展型”、“团块组合型”和“跨界飞地型”三种空间类型^[19]。小池滨江新区处于湖北省与江西省不同行政单元的相邻空间单元，且全部位于湖北省内，同时受到湖北省的武汉城市圈、安徽省的皖江经济带、江西省的环鄱阳湖经济圈三大战略的辐射（图 1），属于“跨界飞地型”的空间类型：即跨界区域位于单一的行政辖区内，是一种社会经济要素的跨界发展，而非空间上的跨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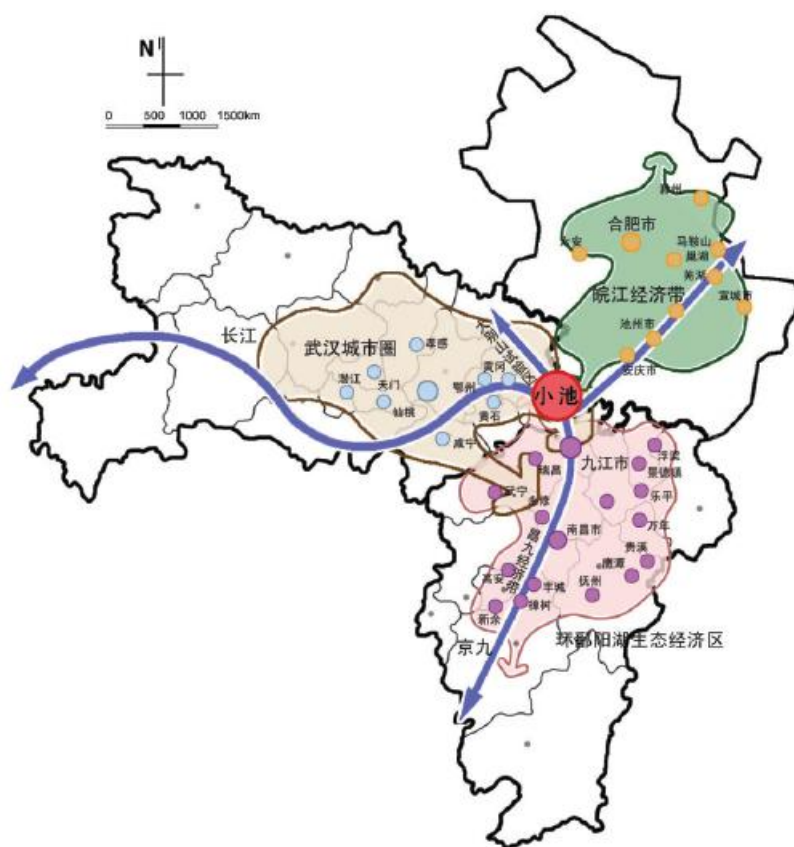


图1 小池滨江新区省际关系示意

Fig.1 Sketch map of inter-provincial relations of Xiaochi Binjiang New District

从跨界阶段看，小池镇自古就是九江市的属地，两地联系密切。通过采取问卷调查发现（具体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 184 份，有效份 184 份）：小池滨江新区居民到九江市的频率很高，有 67.7%的小池滨江新区人至少三月之内到九江市一次，出行到九江市的主要目的为购物，占 52.8%，其次是娱乐和探亲访友；与之相比，九江市居民到小池滨江新区的频率很低，大部分出行目的是走亲访友。这表明，两地的亲缘关系较近、联系紧密，小池居民较为依赖九江市（图 2、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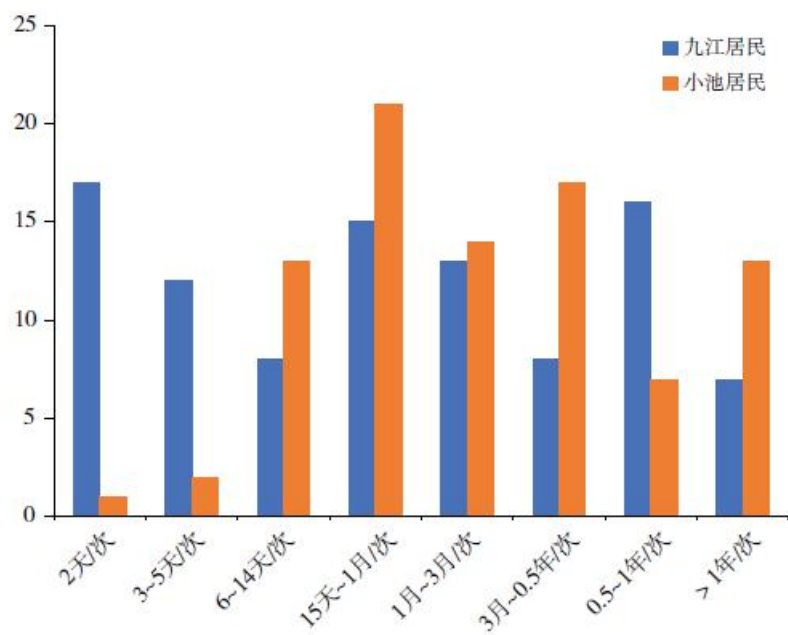


图2 两地居民来往频率

Fig.2 The intercourse frequency of residents between the two pla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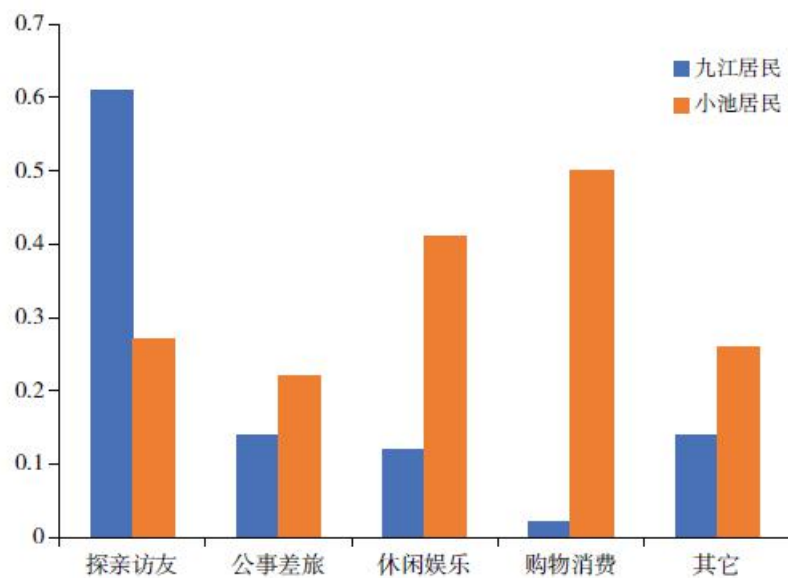


图3 两地居民来往目的

Fig.3 The intercourse purpose of residents between the two places

可见，目前两地主要在物质空间（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行为（居民联系）方面建立联系；受行政区划的影响，在经

济、管理等方面的跨界发展并不成熟。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小池滨江新区跨界发展的实质就是利用土地资源优势（规划总面积48km²）来缓解九江市可建设用地少、人地矛盾突出问题，推动九江市要素跨界流入小池滨江新区内，最终实现共赢。

1.2 小池滨江新区跨界发展的问题

1.2.1 政府层面：政策导向相悖

无论是改革开放后“开发试验区”、“省级经济特区”建设，还是2011年启动的小池滨江新区建设，湖北省制定了系列政策鼓励小池滨江新区开发开放，试图与江西省跨界合作，共谋发展。但江西省并未制定与湖北省跨界融合的发展战略：当前，九江市的空间发展战略有两个主导方向，第一，“昌九同城化”的大九江战略主导其向南发展；第二，“开发八里湖”的新九江战略使其向西发展，以缓解老城空间问题。从而形成沿昌九走廊和沿长江的“T”字型发展战略，九江市并未往北跨江整合小池滨江新区（表1）。可见，尽管国家层面正在推动“中部崛起”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跨界融合发展，但在省际层面政策导向相悖的现实困境却依旧无法破解。

表1 两地发展政策对比

小池镇开发开放政策	九江市空间发展战略
1992 年湖北省政府批准小池镇为“省级经济开发区”	1992 年江西省政府提出打造“昌九工业走廊”的战略，沿京九铁路单轴发展
2005 年小池镇被湖北省政府列为“省长联系口子镇”	2008 年江西省政府提出“昌九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南昌九江经济全面融合发展
2011 年李鸿忠同志提出按九江市的一个区来建设“小池滨江新区”	2012 年《九江沿江开放开发总体规划》提出以“围绕八里湖、建设新九江”的发展战略
2012 年湖北省政府出台《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黄梅小池开放开发的意见》	2014 年省政府公布实施《昌九一体化发展规划》，形成“工”字型发展格局
2016 年湖北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小池改革发展的意见》	2016 年九江市“十三五规划”提出沿长江和沿昌九推进“T”型崛起的发展战略

1.2.2 市场层面：要素流动受阻

小池滨江新区自2011年至今经历了一轮快速发展，规划建设成效显著。在交通设施方面，至2016年底新区新建道路总长超过40 km，整体框架基本形成；此外，2013年九江长江二桥通车、2016年小池港开港等都极大地改善了小池滨江新区外部交通条件，为两地跨界发展提供保障。在土地开发方面，小池滨江新区新增二类居住用地117 hm²，新增工业、物流用地96 hm²，新增商业设施用地26hm²，新增公共设施用地37 hm²（图4）。通过与2011年镇区用地对比发现：五大类用地共计新增393hm²，较2011年的506 hm²接近翻番；特别是二类居住用地增长速度极快，其次为工业、仓储用地（图5）。可见，当前小池滨江新区主要依赖房地产和产业园区推动其空间的快速发展。但目前新区内各楼盘去化率不高，普遍不超过两成；产业零散布局，入驻企业不多。这表明，小池滨江新区目前仅停留在物质空间开发层面，并未承接到九江市人口和产业转移，资源要素跨界流动受

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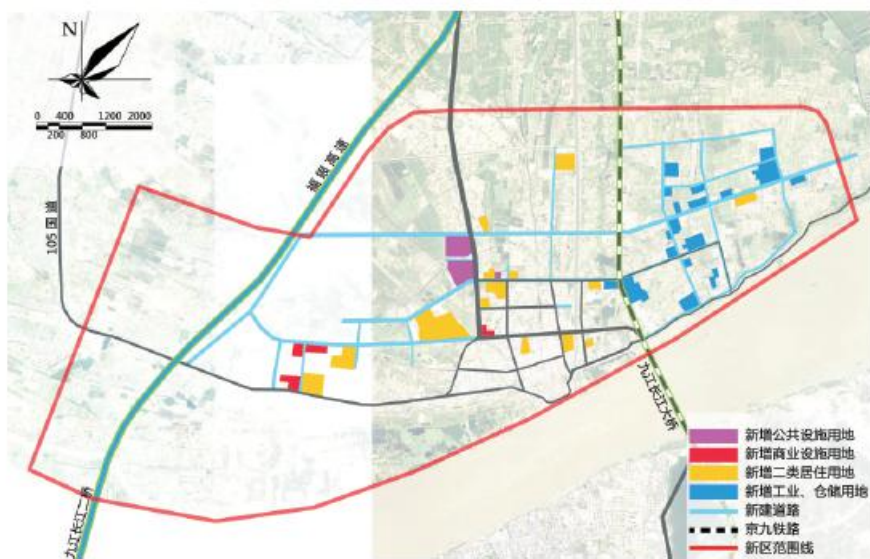


图4 小池滨江新区2016年建设现状
Fig.4 Current construction situation of Xiaochi Binjiang New District in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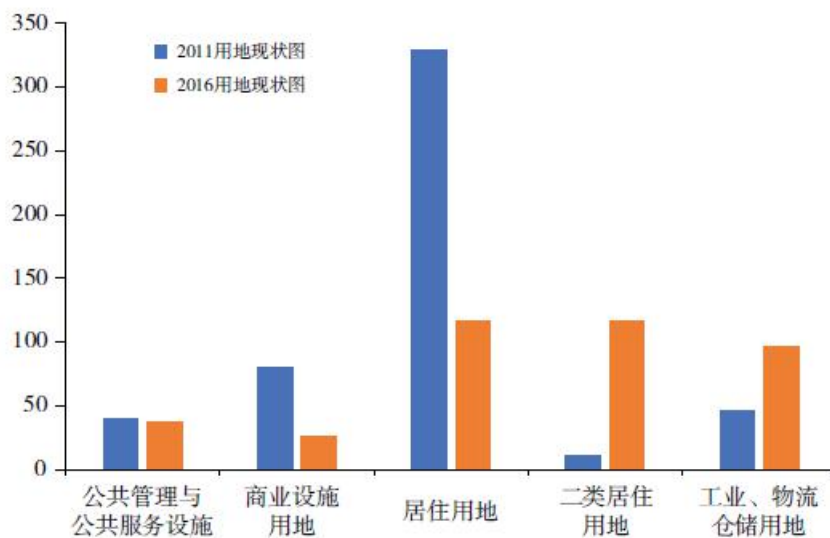


图5 小池滨江新区2011与2016年用地规模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land use scale of Xiaochi Binjiang New District between 2011 and 2016

2 竞合视角下小池滨江新区跨界发展的问题成因分析

2.1 竞合理论与分析框架

2.1.1 竞合理论引入

1989年,美国Novell公司时任总裁R.Noorda在针对竞争对手微软公司提出的商业战略中,首次提出了“竞合”(co-opetition)的概念。随后,哈佛大学A.M.Brandenburger教授和耶鲁大学B.J.Nalebuff教授^[20]在1996年出版了名为“co-opetition”的著作,提出本质上价值创造是一种合作过程,而价值获取(或分配)则是一种竞争过程;企业间在共同开拓或占领市场时通常会相互合作,而在分配市场份额或分配收益时则会相互竞争,并重点分析了竞合的成因。近年来,“竞合”的概念慢慢被运用到区域中来,特别是城市间的合作关系引起诸多关注,这种合作的建立以有利于各城市竞争优势发挥为前提,合作是以竞争为基础的合作,也就形成了城市间的“竞合关系”^[21]。所谓城市间竞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城市在创造共同利益时合作,在划分利益时竞争^[22]。在这种关系中,竞争者之间从单纯的对抗竞争走向一定程度的合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建立起一种正和但可变的博弈结构(positivebut-variable game structure)^[23]。从已有研究发现,城市间竞争是天然存在的,像企业一样在价值创造和分配过程中同时出现合作与竞争状态,这种竞合关系也会一直伴随着区域跨界合作,从而形成一种可变的博弈结构。

2.1.2 城市间竞合的影响因素

Annette Steinacker^[24]基于对大都市竞合的博弈理论研究,总结了影响城市间竞合的四个因素(表2)。

表2 影响城市间竞合的主要因素

序号	影响竞合的主要因素	具体层面
1	合作的共同收益	总收益越大,合作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大总收益必须超过交易成本
		合作能够使每个参与者至少能富裕起来政策层次和分配上的冲突
2	偏好的多样性	层次上一致,但分配上冲突
		层次和分配上都一致
3	博弈者地位和实力的不对称	合作结果的替代选择
		时间偏好或贴现值
4	博弈结构和参数的稳定性	风险规避
		资产专用性或投资偏好转移

①合作的共同收益。城市间在竞合过程中,除非每个城市都能从中获取利益(即合作产生的效益没让任何一方变得更坏,以及至少让一方变得更好),合作才可能展开;特别是当两地间问题越严重的时候,通过解决问题获取的收益越大,合作的可能性才更大。

②偏好的多样性。城市间合作，博弈者有多种偏好选择，一方面，博弈者可能不同意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博弈者都支撑政策目标，但对分配的选择不统一。这就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博弈者对目标本身的否定；第二，博弈者都同意目标，但对产出分配不统一；第三，博弈者在目标和分配方面都达成共识。

③博弈者地位和实力的不对称。如果博弈者太不对称，就没有合作的可能性。强势方要求从成果分配中获取更多，否则选择其它合作安排；而弱势方拥有的替代选择极少，合作是其最佳的选择。分配的公平准则和对被剥削的政治忧虑无疑会阻止弱势方参与到合作中来^[26]，使得合作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④博弈结构和参数的稳定性。由于外部力量影响或者合作协议本身也会随时间发生改变，如地区服务需求增加，选择先服务好本区域，导致其它地区发展成本更高。此外，博弈者自身的偏好也会随时间发生偏离，人口、政治代表、财政能力和其他因素的变化可能导致城市利益的分离，从而影响城市间的竞合选择。

2.1.3 小池滨江新区跨界发展的问题成因分析框架

小池滨江新区当前面临的本质问题就是城市间的竞合问题。小池滨江新区和九江市省际跨界发展涉及到协作机制、财税分配、选择偏好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且明显具有博弈特征：表现出在公共领域、基础设施领域都积极参与；而在具体项目、招商引资方面展开竞争。本文从影响城市间竞合的主要因素视角对问题成因进行分析，具体从“合作的共同收益、偏好的多样性、博弈者地位和实力的不对称、博弈结构和参数的稳定性”四个角度展开，为探索小池滨江新区跨界发展的问题成因提供理论启示（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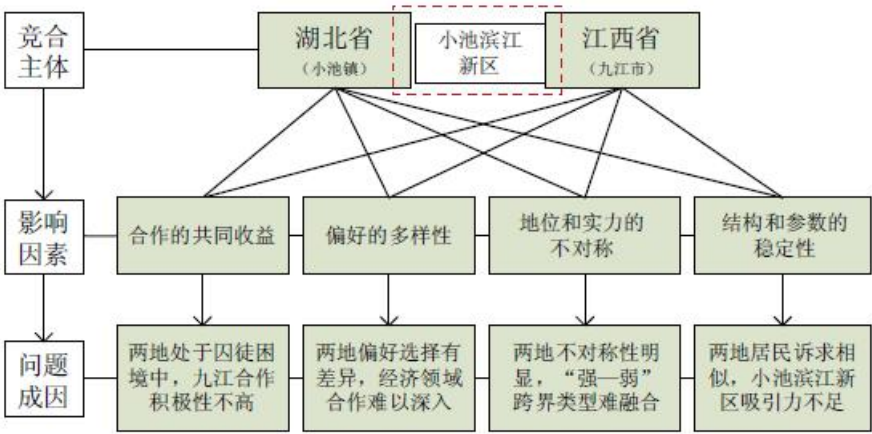


图6 小池滨江新区跨界发展的问题成因分析框架
Fig.6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cause of cross-border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Xiaochi Binjiang New District

2.2 小池滨江新区跨界发展的问题成因分析

2.2.1 两地处于囚徒困境中，九江市合作积极性不高

从合作的共同收益来看，小池滨江新区与九江市省际跨界发展是在区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展开的，总收益并未有实质性增加，只是总收益在区域中的重新配置，属于“零和博弈”的合作模式。如两地展开合作，小池滨江新区通过承接九江市的功能，

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税收、财政等方面都能直接获利，此外还能带动地方的就业与消费。而小池滨江新区获利是建立在九江市损失基础之上的，在这个模式中，小池滨江新区受限于自身条件，选择合作才能获取发展机会；而九江市不管其怎么选择，选择“背叛”总能让它的境况更优（图7）。这也就解释了30年来的两地省际跨界发展未取得实质进展的主要原因：合作并未实现共同获益的原则，导致小池滨江新区比较积极，而九江市明显表现出消极态度。

		九江市	
		合作	背叛
小池滨江新区	合作	A,A	C,B
	背叛	B,C	D,D

注：这里 $A > D, D > C, B > A$ 。小池滨江新区的收益在前，九江市的收益在后。

图7 小池滨江新区与九江市省际跨界合作的“囚徒困境”博弈

Fig.7 The "prisoner's dilemma" game of the inter-provincial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between Xiaochi Binjiang New District and Jiujiang City

2.2.2 两地偏好选择有差异，经济领域合作难以深入

从偏好的多样性分析，两地在不同领域的博弈主要带来三种不同的可能：博弈者不同意政策目标；博弈者同意政策目标不同意产出分配；博弈者在目标和分配方面达成共识。和企业不同，城市系统更为复杂，在偏好的多样性方面以上三种可能都存在。第一，在经济领域，如企业的落地、房屋的购置等都具有排他性（不可分割）和竞争性。在该方面，两地处于竞争之中，一方获利，另一方面就受到影响，竞争大于合作。第二，在公共安全领域，如警察、消防、生态治理等方面具有有限的排他性（不可分割）以及非竞争性，在联盟内部排他。在该方面，两地具有共同的政策目标，协作有利于提升地区的整体安全性，但收益分配和成本分摊很难达成共识。第三，在基础设施领域，如给排水或道路交通设施等都具有可分割性，因而能实现平等的竞争与合作，成本收益分摊容易，该领域最容易达成合作（表3）。可见，两地在公共设施或基础设施领域，由于可分割性及非竞争性的特征可展开合作，实现共同获利。但在经济方面，由于具有不可分割性和竞争性，在政策目标层面上就存在冲突，也就难以跨界融合。

表3 博弈者偏好的多样性分析

博弈者偏好	竞合领域	是否可分割	竞合关系
不同意政策目标	经济领域（产业、住房）	不可分割性	竞争>合作
同意政策目标不同意产出分配	公共服务（公安、消防）	不可分割性	竞争/合作
在目标和分配方面达成共识	基础设施（给排水、道路）	可分割性	合作>竞争

2.2.3 两地不对称性明显，“强一弱”跨界类型难融合

小池滨江新区与九江市不对称性非常明显。一方面，从行政等级角度小池滨江新区属于镇级行政区，虽然在 2012 年被破格升为副县级单位，但和九江市地级市相比，行政等级差异仍较大；另一方面，考察过去 10 年小池镇、黄梅县与九江市的 GDP 发现，小池镇在县域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与九江市比，小池镇经济基础薄弱，总体规模并未得到质的改变（图 8）。可见，九江市在跨界发展过程中明显属于强势方，而小池滨江新区基础相对较差，在跨界合作过程中属于弱势方。这种博弈结构的不对称性使得合作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因为强势的九江市无论在资源分配还是在利益获取方面都会要求更多，其主导着合作协议的制定，否则其完全可以选择不参与跨界合作。而弱势的小池滨江新区本身可选择的机会并不多，跨省与九江市合作最有利于发挥其土地资源优势。因而，两地间“强一弱”的不对称性使得跨界发展更多的表现出小池滨江新区“一厢情愿”与九江市“背叛逃离”的现实境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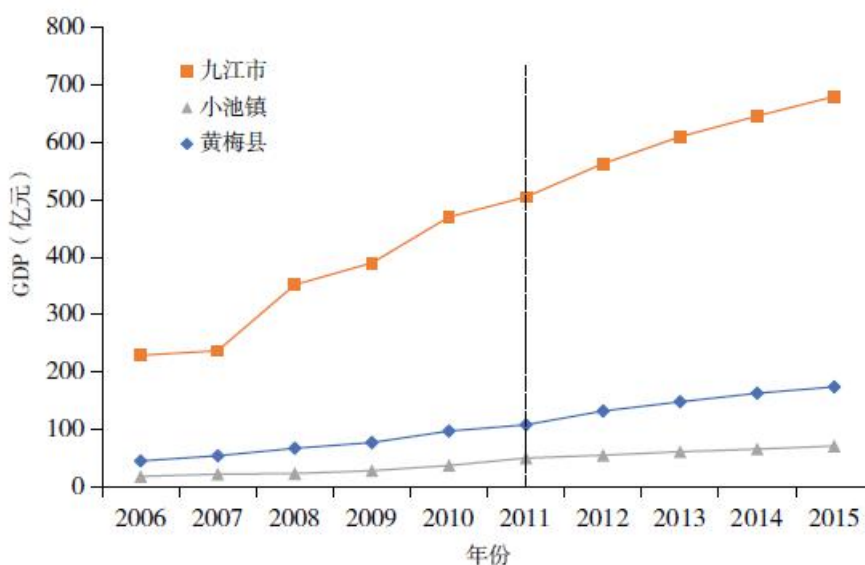


图8 小池镇、黄梅县与九江市 2006—2015 年 GDP 变化
Fig.8 Sketch map of GDP changes of Xiaochi Town, Huangmei County and Jiujiang City from 2006 to 2015

2.2.4 两地居民诉求相似，小池滨江新区吸引力不足

对博弈结构和参数的稳定性分析主要从两地居民诉求来反映，即居民的真实需求对改变两地跨界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根据调查结果发现，尽管两地居民对于跨界发展态度不尽相同（小池滨江新区居民普遍认为跨界发展更有利，而九江居民认为跨界发展会影响九江市利益），但对于两地的优势的判断上保持高度一致。即九江市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经济实力”、“配套服务”、“出行便利”三方面，而小池滨江新区的核心优势仅仅体现在“房价”方面（图 9、图 10）。这表明，小池滨江新区核心竞争力明显不足，在吸引人口和产业等要素方面不具备九江市的优势，这也从市场层面解释了其商品房去化率低、产业集聚不明显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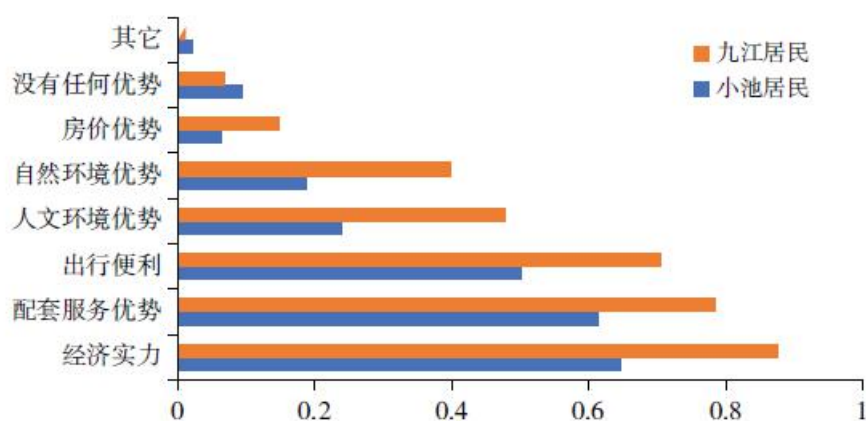


图9 九江市的优势
Fig.9 The advantages of Jiujiang 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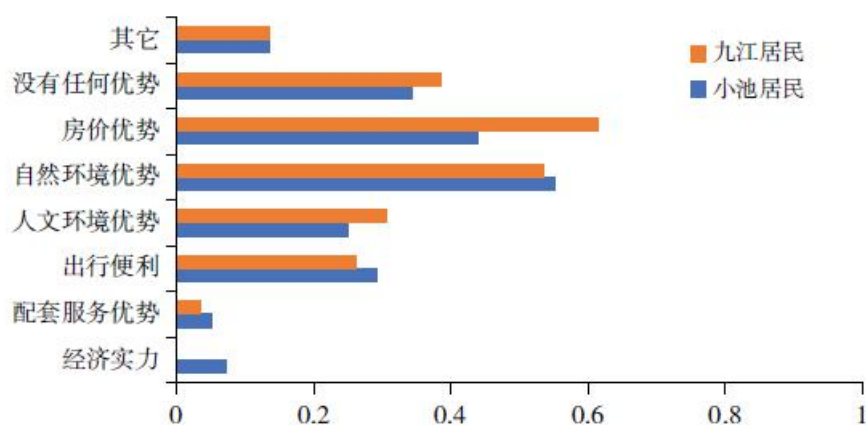


图10 小池滨江新区的优势
Fig.10 The advantages of Xiaochi Binjiang New District

3 竞合视角下小池滨江新区跨界发展的路径探索

3.1 “经济特区”发展路径：鼓励政府间深度融合，打破壁垒，空间共建，利益共享

从政府层面看，小池滨江新区发展受阻的深层次原因是利益分配所致，这种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利益，从而影响了九江市的跨界发展态度。如何实现利益共创、利益共享是化解当前困境的关键，而关键则是推动两地政府间的“深度跨界”，进而打破行政壁垒。具体可按照打造湖北省“经济特区”的要求，推进小池滨江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由湖北省政府和江西省政府牵头，以地方政府为主体，负责重大项目的协调；黄冈市与九江市、小池滨江新区与浔阳区分别进行对接，开展地方政府间的协调工作，负责签订具体项目协议；由两地政府共同组建开发公司，落实规划、产业、交通、环境、基础设施等具体事务，从而重塑两地间跨界融合治理（图 11）。该路径能实现从顶端设计到具体实施的跨界协作，其关键是九江市能深度参与到小池滨江新区的空间共建、利益共享中来。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完全融合的跨界区域只是一种理想的情况^[26]，小池滨江新区与九江市跨界发展到什么程度还需实践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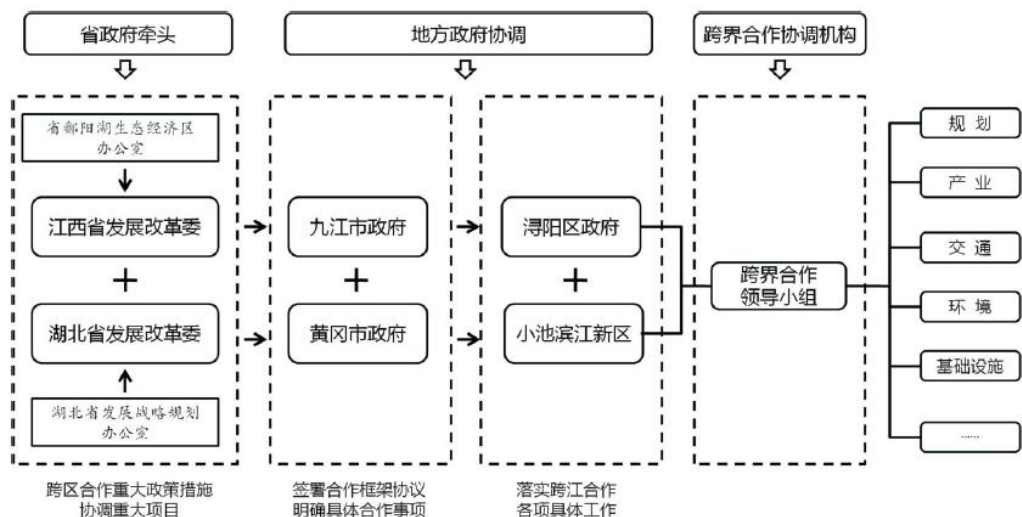


图 11 小池滨江新区省际跨界合作实施机制

Fig.11 Inter-provincial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Xiaochi Binjiang New District

3.2 “边缘城镇”发展路径：回归市场理性，基于区域需求，专门化特色崛起

从市场层面看，小池滨江新区与九江市本质上是“核心—边缘”关系。小池滨江新区处于九江市的边缘区，在本地资源和外来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其可支配资源极其有限，当前政策推动小池滨江新区跨界发展是输血式发展，效果并不理想。受规模经济的影响，两地间的不对称性会越来越明显，九江市作为区域“核心城市”，在跨界发展中始终占据主动地位。根据“核心—边缘”理论，同核心地区专业化分工，是“边缘城镇”增长的主要途径^[27]。因此，小池滨江新区当前切实可行的路径应该是与九江市专业化分工，通过特色而不是规模来实现区域地位的提升。具体可通过挖掘小池滨江新区周边现状资源，如港口物流资源、北侧国有“龙感湖农场”①的产业资源及黄梅县“禅宗文化”②的旅游资源等，通过与九江市专业化分工实现特色崛起。

4 结论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省际间的要素流动愈加频繁，而省际跨界区域的城镇作为要素毗邻区，更容易在空间上产生直接关联。受经济发育条件、自然地理条件、地方政策、人文习俗等多要素的影响，我国各地区间的省际跨界发育程度、模式各不相同，并不具备可复制与可推广的借鉴意义。本文以小池滨江新区为例，通过实证发现，当前小池滨江新区试图单纯通过土地开发来承接九江市人口和产业跨界流入的路径并不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九江市积极性不高，作为跨界发展的强势方，九江市并愿意参与跨界要素流动，使得小池滨江新区跨界融合“一厢情愿”，两地属于典型的“强—弱”跨界类型。分析发现：①在区域资源有限的背景下，两地间属于“零和博弈”，一方获利，另一方就有损失，无疑合作是有益于小池滨江新区的，因而九江市选择“背叛”更有利。②在具体竞合领域，受偏好多多样性的影响，两地在基础设施领域更容易合作，而在经济领域合作难以深入。③两地间在行政等级和经济规模方面的不对称性非常明显，强势的九江市无论在资源分配还是在利益获取方面都占主导地位，主导竞合关系。④在资源优势方面小池滨江新区并不具备九江市的吸引力，导致其商品房去化率低，产业集聚不明显。当前，小池滨江新区跨界发展整体处于竞争大于合作阶段，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市场层面都面临较多问题，湖北省单方面的政策推动并未解决根源问题，只能在非竞争项目方面展开部分合作。破解小池滨江新区跨界发展受阻可以从两方面入手：①从政府层面，探索“经济特区”发展路径，通过两地政府间的深度融合，打破壁垒，实现利益共享；②从市场层面，探索“边缘城镇”发展路径，基于区域需求，回归市场理性，与核心城市专门化分工，实现特色崛起。

尽管小池滨江新区在跨界发展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但从区域统筹示范及跨界发展路径探索方面意义重大。本文突破常规

的空间分析思路,构建了基于竞合视角的省际跨界发展的问题分析框架,对我国类似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与新视角。然而,本文没有就发展路径做更深入的研究,同时对于跨界发展受阻的成因仅从定性角度进行了分析,对于以上问题,将在进一步的研究中继续深入。

参考文献:

- [1] Jacobs J.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Principles of Economic Life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 [2] 张五常. 中国的经济制度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156.
- [3] 吴旬. 中国地方政府间制度竞争的经济效应分析 [J]. 山东经济, 2004(4): 11 - 14.
- [4] 谢晓波. 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6: 26.
- [5] 沈清基. 见微知著: 读《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城市规划》后的若干思考 [J]. 城市规划学刊, 2010(3): 116 - 119.
- [6] Tsui-Auch L S. Regional Production Relationships and Developmental Impa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Production Networks [J]. Access and Download Statistics, 1999, 23(2): 345 - 360.
- [7] Ramasamy, Cremer B R D. Cities, Commerce and Culture: The Economic Role of International Sister-c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Asia [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2007, 3(3): 446 - 461.
- [8] Ehlers N. The Utopia of the Binational City [J]. GeoJournal, 2001, 54(1): 21 - 32.
- [9] Perkmann M, Sum N. Glob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and Cross Border Regions: Scales, Discourses and Governance [J].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34 - 58.
- [10] JAMES Wesley Scott.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contexts for cross - border regionalism [J]. Regional Studies, 1999, 33: 605 - 617.
- [11] Buursink J. Becoming Twin Citizens in Minneapolis and St Paul: A Case of Territorial Integration, Contemporary City Structuring: Society of South African Geographers [C]. 1996: 78 - 92.
- [12] 王盈, 罗小龙, 许晓, 等. 双子城跨界融合研究——杭州临平与嘉兴海宁跨界发展的实证研究 [J]. 经济地理, 2015, 35(8): 89 - 97.
- [13] 罗小龙, 沈建法. 基于共同利益关系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合作: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为例 [J]. 经济地理, 2008, 28(7): 543 - 547.
- [14] YANG Chun. From Market-led to Institution-based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Hong Kong [J]. Issues and Studies, 2004, 40(2): 79 - 118.

-
- [15] 沈建法. 城市跨界发展与融合——港深案例研究 [J]. 城市规划, 2013(6): 20 - 25.
- [16] 刘永敬, 罗小龙, 田冬, 等. 中国跨界新区的形成机制、空间组织和管治模式初探 [J]. 经济地理, 2014, 34(12): 41 - 47.
- [17] 罗小龙, 沈建法. 跨界的城市增长: 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例 [J]. 地理学报, 2006(4): 435 - 445.
- [18] 仇方道, 佟连军, 朱传耿, 等. 省际边缘区经济发展差异时空格局及驱动机制: 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J]. 地理研究, 2009, 28(2): 451 - 463.
- [19] 刘永敬, 罗小龙, 田冬, 等. 中国跨界新区的形成机制、空间组织和管治模式初探 [J]. 经济地理, 2014, 34(12): 41 - 47.
- [20] Brandenburger, AM, Nalebuff, B J. Coopetition: A Revolutionary Mindset That Combine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Market place [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6.
- [21] 苏斯彬. 竞争性行政区经济与区域合作模式重构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22.
- [22] 线实, 陈振光. 城市竞争力与区域城市竞合: 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J]. 经济地理, 2014, 34(3): 1 - 5.
- [23] Giovanni Battista Dagnino. Coopetition Strategy: A New Kind of Interfirm Dynamics for Value Creation [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uropean Academy of Management Second Annual Conference-Innovative Research in Management. Stockholm, May 9 - 11, 2002.
- [24] Annette Steinacker. Game Theoretic Models of Metropolitan Cooperation[C]//Richard C. Feiock.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Conflict,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4.
- [25] Thaler Richard. Anomalies: The Ultimatum Game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88, 2(4): 95 - 206.
- [26] Brunet-Jailly E. Theorizing Borders: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J]. Geopolitics, 2005, 10(4): 633 - 649.
- [27] John Friedmann.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 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 [M]. Published Cambridge, Mass: M. I. T. Press, 1966.